

中國的革命與現代化

◎ 孔凡義

一 革命：概念及其闡釋

革命 (revolution) 這一術語出現於十五世紀的義大利，專指用暴力突然推翻統治者 (政變) 一事。這一術語源於占星術家在行星處在某種特定位置時所預言的命運之突然轉折的概念。它於1662年在英語中第一次出現，克拉倫登伯爵愛德華·海德用它來形容國王查理二世的復位，此後這一術語又被用來指詹姆士二世的退位，由此便首創了這樣的概念，即通過這類革命性的變化可以獲得一種理想的秩序¹。

革命的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革命概念是指一種暴力性政治參與，它一般以奪取政權和恢復正義的政治秩序為目標。西方十八世紀政治思想家一般都是運用的廣義革命概念。洛克認為，政府的合法性並非來自上帝的授意，政府的目的是保護個人的財產權和增進福利，如果政府不能保護臣民的權利，人民的反抗或革命就是合理的。傑弗遜繼承了洛克的革命思想，認為革命是人民爭取「天賦人權」的努力。伯克也是在廣義上運用革命概念的，他否認法國大革命的合理性，因為他們的君主並非僭主，只有推翻僭主制政府的反抗才是合理的。杜克海姆把革命、起義、暴亂混合起來使用。他認為，由於現代社會變得愈來愈複雜，個人愈來愈孤獨，由於喪失了傳統的價值觀念的指導，他們更易於產生反常和暴力行為。在中國的傳統政治文化中，革命的內涵也是廣義的，它意味著朝代更替和合法性的重建，「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改朝換代和天地運轉、四時更替一樣是不可避免的，天意和民心 (合法性) 的喪失是朝代更替的根本原因。

狹義的革命概念不僅僅是指政權的更替或正義勝利，而是政治、社會和經濟秩序的大規模重建。馬克思運用的是革命的狹義概念，他說：「每一次革命都破壞舊社會，所以它是社會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舊政權，所以它具有政治性。」²在馬克思看來，革命具有進步性，它是先進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代替落後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是歷史發展的動力所在。亨廷頓認為，革命「就是對一個社會據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念和神話，及其政治制度、社會結構、領導體系、政治活動和政策，進行一場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國內變革。」³亨廷頓的革命概念把革命同政變、起義、叛亂和獨立戰爭區別開來，他認為革命的本質在於社會結構和價值觀念的變更。漢娜·阿倫特也認為，「用暴力和變革來描述革命現象都是不夠的。只有在變革的發生意味著一個新的起點，在暴力被用來構成一個完全不同的政府形式，並導致形成一個新的政體時，才談得上革命。」⁴查默斯·詹隼認為，「革命就是使用暴力改變社會體系。更確切地說，它有目的地使用暴力策略以實現社會結構的變化。」⁵

從上述可以看出，政治理論家主要是從四個角度來研究革命的：一、合法性的角度。他們認

為革命是權威喪失的後果，是政治合法性的重建。洛克、傑弗遜是這一理論的代表。二、文明的角度。馬克思是革命文明論的闡釋者，他認為革命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力。三、心理的角度。杜克海姆把革命看作是現代社會心理淡漠和壓力的反應。四、社會結構的角度。漢娜·阿倫特、查默斯·詹寧都堅持認為只有實現社會結構變化的暴力才能稱為革命。這四種革命理論都闡明了革命某些方面的內涵，並具有啟發意義。概而言之，研究革命要涉及到政府權威、社會結構和暴力行為等方面的內容，革命是社會體系內部通過暴力改變政治權威和價值分配體系的變動。也就是說，革命是一種社會變動，這種社會變動力圖改變原有的政治權威和價值分配體系。革命是體系內的衝突，並且它必須是通過暴力來實現的。

二 革命與現代化的相關性分析

亨廷頓和巴林頓·摩爾都很重視革命與現代化之間的關係。亨廷頓認為，革命是一種有限歷史現象，它是現代化的產物。革命的產生是由於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過程中，政治意識迅速擴展和新的集團迅速被動員起來參與政治，其速度和數量超越了政治制度的容納能力。也就是說，革命是政治參與的爆炸性的極端事例，是政治參與和政治制度化之間矛盾的產物。亨廷頓認為，革命對現代化也有促進作用，革命所帶來的政治認同、道德更新和權威重建對於現代化都具有積極意義⁶。巴林頓·摩爾通過對現代化的比較研究，揭示了現代化是複合模式的過程，不同國家現代化的道路是不同的，革命暴力在現代化過程中扮演著積極的角色，在通向民主道路中，暴力革命是重要的一環。在巴林頓·摩爾看來，不同的革命類型會產生不同的現代化後果。英法成功的「資產階級革命」產生了資本主義和民主政府；日本和德國失敗的資產階級革命產生了資本主義，卻沒有產生民主；俄國和中國成功的無產階級和農民革命則產生了共產主義和專制政權；印度缺乏革命，既沒有產生專制政權但民主道路面臨困境⁷。

通過比較可以看出，亨廷頓和巴林頓·摩爾關於革命與現代化關係的論點是不同的，「亨廷頓認為，現代化是革命的結構性原因，而摩爾卻認為，革命是現代化的結構性原因。」⁸那麼，他們的觀點是不是相互矛盾的？答案是否定的。革命與現代化之間是互動關係，現代化無疑有助於革命的發生，革命也反過來對現代化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不過，我們必須看到，革命對現代化的促進作用是有限的，革命也會導致現代化發展的困境。具體來講，革命與現代化的關係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現代化為革命提供條件預設。現代化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權威逐步世俗化，經濟迅速發展，結構功能逐漸分化，價值衝突不斷激化。權威的世俗化意味著權威合法性的轉變，也就是世俗權威代替宗教神權。但是，現代化過程中的權威替代並非一蹴而就的，在傳統權威式微和現代權威建立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時間差——傳統權威與現代權威的衝突時期，這種衝突構成了革命的合法性基礎。自經濟起飛後，社會步入現代化時期，但經濟的迅速發展會滿足人們的經濟期望更會擴展人們的期望，而且兩極分化、社會流動、傳統集團的地位喪失都會導致社會動盪，這構成了革命的社會條件。在現代化過程中，社會日趨專業化和部門化，新興集團如軍人、知識份子、律師、商人等從傳統的社會集團如教會、官僚、部族中分離出來並獲得了獨立性和組織性，這些新興集團與傳統社會的利益和價值觀都存在著衝突，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和價值觀要求政治參與、改變政治體制，成為革命的組織力量。價值衝突在現代化過程中也是普遍存在的，受現代教育普及的影響，人們在態度、價值觀和期望等方面和傳統社會分道揚鑣，並向現代社會的人們看齊，現代社會

的價值觀也就成為了革命可資利用的意識形態。總而言之，「現代化會給政治系統增加愈來愈多的壓力和緊張」⁹，形成「革命情勢」（revolutionary feeling），它是革命的必要條件。

二、革命為現代化提供資源供給。革命改變了原有的政治權威和價值分配體系，革命所帶來的權力集中、秩序重建、政治認同有利於整合資源，為現代化發展提供支持。現代化初期的政策創制和體制驅動都離不開權力集中，現代化需要具有高度權威的政府來整合資源。通過革命可以建立高度權威和統一的政治，改變權力支離破碎和資源分散的局面，為權力集中和政治整合提供支撐。革命還可以為現代化提供秩序供給，有利於政治參與與政治制度化的平衡。通過革命，現代政治戰勝傳統政治，社會衝突程度緩解，新的現代政治共同體得以確立，有利於政治穩定。革命還可以創造高度的政治認同，革命摧毀了舊的社會秩序及其階級、多元主義和局部忠誠，革命意識形態提供了政治效忠的新標準，革命政府和精英獲得普遍的認同，精英之間建立高度的團結和信任，受革命洗禮的大眾樂於服從政府和精英的領導。強大政府、穩定的政治秩序和高度的政治認同都是現代化所稀缺的資源，是防止現代化的受挫所必需的。

三、革命不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現代化有利於形成革命情勢，那是不是現代化就一定導致革命的發生呢？其實，革命情勢只是革命發生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現代化有利於革命情勢的形成但未必導致革命的發生。相反，現代化的有些因素是不利於革命的發生的。例如，農業商品經濟化的水準高就可以避免嚴重暴力的爆發。作為現代化結果的城鄉衝突會離異知識份子和農民的聯盟，這也是避免革命發生的重要因素。在東亞權威政體中，如韓國、馬來西亞，現代化領導精英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順利完成了工業化和民主轉型。所以，革命的發生與否還與領導精英有關，現代化的團結的領導精英是不利於革命爆發的。

四、革命可以導致革命後社會現代化的困境。革命的成本是巨大的，革命對傳統社會摧毀的後果就是經濟崩潰、道德失範、社會混亂，革命後社會現代化既要進行秩序重建又迫切需要經濟發展。其次，革命後社會的政權由於革命的經歷而傾向於高度集權。革命需要克裏斯瑪型的領袖來整合革命者的意志，激發軍隊的戰鬥力。迫於軍事壓力，為了提高軍事效率，革命團體形成高度集權的領導體制，它一直延續到革命後社會。這種高度集權領導體制是腐敗滋生的溫床，它侵蝕著現代化所必需的政府權威，影響資源分配的正義，容易導致社會動盪和現代化的受挫。再次，革命的恐怖使人們成為革命意識形態的囚徒。在革命過程中形成的革命意識形態內化為人們的政治心理，形成革命的政治文化，如平民主義、激進民族主義、平均主義、革命萬能論、零和博弈論等對現代化發展都是具有副作用的，現代化的發展呼喚意識形態的突破。但是，意識形態的突破又是佈滿了陷阱，容易造成權威流失和政治失序，革命與現代化緊張突出出來。最後，從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角度看，革命導致社會的政治化。正如王滬甯先生研究所得出的結論，經過革命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的社會在不同程式上都具有黨政一體化、議行一體化、政經一體化、政法一體化和政社一體化的高度集權特徵¹⁰。這種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實際上就是執政黨、國家、社會一體化，執政黨主導國家，國家主導社會，其結果就是國家能力虛弱，社會自主性喪失，現代化進程緩慢。

革命是社會機能綜合性失調的產物，它是通過暴力實現的，是強制性社會變遷。現代化則是爆炸性增長的結果，通過漸進改良也可以實現，並且現代化是個歷史的過程，它是對特定時期社會變遷的描述。革命和現代化屬於社會變遷的範疇，二者在特定歷史時期具有共生性而交織在一起，它們都涉及到權威重建和結構變動問題。

三 現代化的危機和革命的路徑依賴

中國的現代化屬於後發外生型，其起始動力來源於西方的衝擊。西方的衝擊直接導致了中國傳統社會的迅速解體和現代經濟的產生，但另一方面，它也使中國社會陷入主權危機和治權分裂之中，現代化資源匱乏、社會分化嚴重，傳統權力結構無法有效地進行社會整合來應對社會的「全面危機」。

「全面危機」是由於兩個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西方的掠奪性入侵，一是傳統政府能力低下。西方的入侵把中國捲入世界現代化的浪潮之中，從此中國現代化成為了不可逆轉和迫在眉睫的任務。但是，西方的入侵是掠奪性的，他們以武力相威脅不斷蠶食中國的領土和法權，中國的白銀源源不斷流向國外，經濟資源匱乏。另一方面，中國政府的領導精英沒有能夠像俄國、日本那樣迅速地向現代精英轉型，1905年科舉制的廢除割斷了現代精英與傳統權力體制的聯繫，中國的權力結構雖然備感壓力但沒有進行有力地改革，政府仍然腐敗不堪、效率低下。羅茲曼對此也作了論證，「中央政府各部門的衰敗可謂最明顯，這些部門愈來愈無力團結中國的精英階層去履行自己應盡的職責，以確保工藝和行政管理的活力。不僅中央政權日以孤立，而且仰仗中央政府權威的省級行政機關同時也削弱了。」¹¹總之，傳統政府的權威、效力和適應性無法對內有效地進行社會整合，對外也無力應付外敵的挑戰，國家的發展落後於社會的現代化。在這種歷史背景下，中國不存在現代化所必需的兩個先決條件，即主權獨立和治權集中¹²，現代化無從起飛。

現代化危機對中國傳統社會造成了深刻的影響，精英不斷走向分裂。在清朝末期，精英分裂在十九世紀60年代就已經開始，洋務派與頑固派分離，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來實現現代化。這次分裂是很有限的，他們的分歧只是表現在是否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的問題上，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政治制度洋務派和頑固派一致的。十九世紀末，傳統政治精英進一步分裂，君主專制政體遭受質疑，君主立憲派從傳統政治精英中分離出來，他們試圖通過體制內的政治參與來走向現代化，但是傳統政治精英為保護自身利益拒絕改良，戊戌變法失敗，體制內改良的道路被傳統政治精英拋棄了。廢除科舉制對傳統政治體制更是帶來顛覆性的後果，知識份子通向體制內政治參與的道路被割斷，現代化的知識份子游離於體制外要求政治參與。在二十世紀初的精英分裂同前兩次精英分裂有很大不同，這些現代化精英不僅同傳統精英徹底決裂，而且要求通過政治革命來重建政治制度和政府權威。

在二十世紀初，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政體已名存實亡，國家權力分散化，君主專制成為了革命的目標。清朝中央政府權威流失嚴重，已經無力把國家權力集中起來進行有效社會整合，現代化建設資源有限。1895年甲午戰爭和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進一步剝奪了中國的部分主權，清朝中央政府的權力受到國外列強的侵蝕，中央政府權力萎縮。在十九世紀中後期，迫於鎮壓農民暴動的需要，地方政府稅收和軍事權力增強，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管制能力下降。而且在清朝末年，此起彼伏的農民起義消耗了中國的大量資源，既無力整合資源進行經濟建設有無力維護政治秩序，地方主義的興起更是使現代化步履艱難。正如羅茲曼認為，「使得十九世紀中國對西方挑戰反應遲緩的根本原因，還是在於國家對經濟活動干預有限，因而地方得以使用並分配資源這樣一種歷史積習，特別是地方上高度自給自足的狀態，束縛了中國發動革新的手腳。」¹³

傳統政治體制的現代化轉型現代化的體制內動力不足，體制外政治參與超出清政府政治控制

的能力，革命成為現代化精英的共識。在清政府政治精英中，君主專制思想一直居於主導地位，在政治體制內分化出來的政治精英的數量和可控資源都非常有限，無法在體制內推動政治體制的轉型。妨礙傳統政治現代轉型的體制內動力不足的第二個原因來自於中國傳統政治體制的自身惰性。中國傳統政治體制在應對傳統社會內部的挑戰表現出了高度的全面性和完美性，人們相信從漢朝以來高度穩定和倫理公正的舊政治秩序可以不必經過過多的改革就可以應對現代化的衝擊。

在二十世紀初期，革命已經成為中國現代化的唯一路徑，它是由中國傳統社會「全面危機」、精英逐步分裂、政府權威流失、地方權力分散共同作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專制政體，但是它去推動了治權的進一步分裂。對於這一問題，巴林頓·摩爾有詳細地描述，他認為，在辛亥革命之後「事實上，政治的權力落到了地方總督的手中，這種情況至少有持續了十五年。在這一階段中，在一些重要區域，掌握著權力的貴族要麼是轉變成軍閥，要麼和個別軍閥聯合起來。整個社會和文化中賦予鄉紳以合法地位的機構已成昨日黃花，鄉紳的後代將變成徹頭徹尾的地主、強盜，或是地主加強盜，這種趨勢早在帝國時期就以潛伏在表層現象之下。」¹⁴所以，即使是在辛亥革命之後，權力分散仍然是中國現代化的主要障礙，民族國家只是具有文化意義上的形式，政治制度的一體化還遙遙無期，通過政治整合實現社會整合是中國現代化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1928年國民黨建立的黨—國家體制本質上是辛亥革命失敗的產物，當然也受到了蘇聯模式的影響。國民黨政府收回了部分主權，政治錄用也傾向於現代化知識份子，初步完成了國家的統一，滿足了現代化最初的和最有戰略意義的需要。但是，國民黨黨—國家體制仍然處於現代化的困境之中，它並沒有促進中國農業商品經濟化的成功。巴林頓·摩爾研究表明，國民黨政府是極權主義政權在中國的興起，它推進現代化進程的能力非常微弱。首先，國民黨政府是城市工商業、金融業和鄉紳後裔的聯盟政權，其在農村的土地政策無非是力圖維護舊有秩序，商業的影響蠶食著農民的所有權，財富高度集中於新興聯盟階層手中，其無意於農業的商品經濟化。第二，國民黨意識形態的衰落決定了其社會動員能力低下。國民黨意識形態是傳統主義的復活，它缺乏明確的社會和經濟綱領，國民黨的社會動員僅限於農村和城市中的食利階層，無法深入到社會的最基層。第三，日本的入侵和社會主義革命的興起再一次使國民政府陷入主權危機和治權分裂的兩難境地。國民政府的統一是有限的，在南方共產黨軍事力量繼續存在，軍閥勢力在地方上仍然限於表面的忠誠。日本的入侵使國民政府恢復主權的努力毀於一旦，民族主義的興起也困擾著國民黨的政治決策。最後，在黨—國家體制下，國民黨壟斷了國家權力，它不僅壓制大眾政治參與，還直接導致國民黨政權與民族主義精英的分裂。

國民黨黨—國家體制同樣缺乏現代化的內源驅動力，其極權主義和傳統主義性質決定了他是無意於推進現代化的，低度的政治權威和政府能力無力處理日本入侵、社會主義革命和現代化危機的三重壓力。更重要的是，國民黨黨—國家體制排斥民族主義精英的體制內政治參與，體制外革命成為了民族主義精英解決中國危機的路徑依賴。

四 革命與現代化：社會主義取向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的革命和現代化走向社會主義軌道，革命、現代化和社會主義從此主導著中國的政治發展和歷史進程。在革命與社會主義、現代化與社會主義之間及緊密相連又關係緊張，這就是社會主義革命之所以成功而革命後社會社會主義現代化受挫的共同

原因。在革命社會和革命後社會初期，中國共產黨比較合理地處理了三者之間的關係，從而贏得了政權和初步的經濟績效。但是，在二十世紀50年代中後期，革命、社會主義、現代化之間的緊張關係開始凸現出來，中國的政治體制和功能沒能及時轉型，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產生。

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模式深受蘇聯的影響，但是又另闢蹊徑與蘇聯模式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無論是中國的社會主義還是蘇聯的社會主義，它首先都是一種革命理論，主張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實現社會主義的社會轉型。對於社會主義來講，「革命之所以必需，不僅是因為沒有任何其他的辦法能推翻統治階級，而且還因為推翻統治階級的那個階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跑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陳舊的骯髒東西，才能稱為社會的新基礎。」¹⁵社會主義者認為，社會主義轉型是不同於以往任何社會轉型的，它是非剝削階級代替剝削階級，只有通過暴力才能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掌握國家政權，消滅資本主義經濟基礎。社會主義的理論邏輯是，首先無產階級通過革命暴力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掌握國家政權，這是政治革命。然後，無產階級利用國家政權打碎剝削階級的國家機器，消滅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建立起社會主義經濟關係，這是社會革命。政治革命是社會革命的前提，正如列寧所說，「要完成這個社會革命，無產階級應當奪取政權，因為政權會使他們居與主人的地位，使他們能夠排除走向自己偉大目的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礙。在這個意義上說來，無產階級專政是社會革命必要的政治條件。」¹⁶中國的社會主義也是按照這條路線進行的，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了工業資產階級和鄉紳的聯盟政權（政治革命），1953-1956年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社會革命）。

社會主義對於中國的革命勝利是至關重要的。社會主義理論是由列寧創立的，它帶有鮮明的民族主義特徵，強調民族自決權。中國共產黨吸收了列寧社會主義理論中的民族主義成分，以民族解放為口號進行政治動員，這使得共產黨的政治認同在與國民黨相持過程中逐步獲得優勢。仿照蘇聯模式，中國共產黨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進行建黨，黨的基層組織滲透到城市和鄉村的各個角落，黨的中央領導機關享有高度的權威，形成了高度集權的黨組織體系。這種高度內斂的組織結構具有很強的擴張功能，可以有力地、迅速地進行政治動員和汲取資源。中國共產黨構成了城市知識份子與農村農民的聯繫，他們利用社會主義階級鬥爭學說來激化社會矛盾，向革命分在灌輸革命意識，取得革命領導權。

在中國，社會主義是經過革命路徑實現的。但是，列寧社會主義理論在中國革命過程中顯然是經過改造的，在革命初始階段，列寧社會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際發生了衝突。王明和毛澤東的鬥爭可以說是這種衝突的縮影。在革命後社會，革命與社會主義之間矛盾更加明顯，因為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革命作為社會主義的手段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穩定的政治秩序，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要按照經濟發展的規律來進行。也就是說，革命後社會主義建設需要領導精英、權力結構、政治意識、政治功能由革命社會向改良社會轉型。是改良而非革命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路徑依賴，否則在社會主義取向下的革命只會導致社會主義制度的顛覆和社會主義合法性的喪失。社會主義時代的來臨意味著革命路徑的告別。

現代化的基本內涵是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社會主義的核心內涵是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二者之間存在交集但又明顯不同。首先，從二者的歷史起源來看，早發現代化是以資本主義方式出現並取得成功的，而社會主義理論的形成是與資本主義的批判密切相關的。在英、法、美等國，現代化與資本主義是相伴而生的，與工業社會代替農業社會的同時，土地政治

也走向資本政治。社會主義理論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產物，它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揚棄。對資本主義的態度不同，構成社會主義與現代化的分野。其次，在落後國家，社會主義與現代化之間存在著矛盾。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社會主義將首先會在已經實現現代化的資本主義國家實現。但是，在落後國家沒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現代化的經濟基礎和資本積累，社會主義面臨困境。所以，是先進行現代化的資本積累還是先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成為了兩難選擇。最後，社會主義社會傾向於一元化結構，易導致黨政不分，從長遠來看這是不利於現代化建設的。例如列寧在對黨政關係的態度上一直矛盾重重，一方面主張黨和國家職能分離，「必須十分明確地劃分黨（及其中央）和蘇維埃政權的職責；提高蘇維埃工作人員和蘇維埃機關的責任心和獨立負責精神，黨的任務則是對所有國家機關的工作進行總的領導，而不是象目前那樣進行過分頻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瑣碎的干預。」¹⁷另一方面，列寧又主張黨政不分，黨政一體化。1920年11月，列寧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會議上指出：「黨的上層領導就是蘇維埃機構的上層領導，這是一回事。」¹⁸ 1921年3月，列寧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又指出：「作為執政黨，我們不能不把蘇維埃的『上層』和黨的『上層』融為一體，現在是這樣，將來也是這樣。」¹⁹這種黨政不分的社會結構嚴重制約著國家能力和社會自主性的生長，不僅容易滋生腐敗而且不利於經濟的發展。

當然，社會主義與現代化之間並不是絕對對立的。落後國家可以通過現代化建設，實現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過渡，可以為社會主義建設奠定必要的政治、經濟、文化基礎。也就是說，在經濟落後國家必須走先現代化再社會主義的道路。正如林尚立所言，「對於經濟和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來說，走向社會主義所需要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過渡時期，主要是解決如何使整個社會的生產方式從傳統轉向現代的問題，因為，只有實現了生產方式的這種轉型，社會主義才有在這些國家紮根和發展的可能。」²⁰現代化時期也就是「過渡時期」，這是落後國家的社會主義轉型不可逾越的階段。在這個階段內，社會主義「一黨領導」體制對於現代化在短時期是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的。首先，「一黨領導」確立了共產黨所獨有的政治權威，有利於社會整合和政治整合。其次，在「一黨領導」體制下，共產黨可以在社會與國家之間建立聯繫，有利於現代化創制和政策執行。最後，「一黨領導」體制有利於社會動員和政治穩定。

五 社會主義革命背景與現代化的受挫

1949-1956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中國取得了現代化建設所必需的要件：主權獨立和治權集中。中國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共產黨具有推進現代化建設的權威，國家機構也逐步建立起來並且具有大規模經濟計劃的能力。然而，正當人們為中國的現代化歡欣鼓舞之時，現代化危機在中國爆發，它進一步觸發了一場政治危機。「大躍進」幾乎葬送了中國革命後幾年的經濟成果，「文化大革命」不僅惡化了現代化的危機，而且中國共產黨的權威也遭受重創。現在來反思革命後社會現代化的受挫發生機制，我們可從很多角度進行分析，並且能夠得出很有說服力的解釋，如權力鬥爭、外交壓力、精英個性、冷戰思維、領導體制等等。但是，在這些解釋的背後，有兩個因素扮演著更加具有決定意義的角色：社會主義和革命。

首先，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是通過「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取得勝利的，農民是革命的主力軍。但是，通過工人運動和城市暴動的路徑在中國革命中還是存在的，只是這條道路處於次要地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這種特殊性在革命後社會帶來了重要影響，政權領導者因為革

命經歷不同而容易分裂，知識份子在革命後社會不能佔據有利地位。精英分裂是導致中國現代化受挫的重要變數，而精英分裂的發生與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背景是絕然不可分的。「革命的背景極大地提高了政治競爭的賭注，將許多差別轉變成為政治性的和關於人類生存的競爭。在這樣的背景下，『容忍異議』的協議並非不可大成，但這也許是一種罕見的奢侈品，也要承擔風險。當政治鬥爭的結局無論對個人虔誠還是對社會的長期建構都顯得舉足輕重時，那些矢志不渝地忠於自己的野心和理想的鬥爭參加者，將會毫不猶豫地突破遊戲『規則』。」²¹

革命後社會的精英分裂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權力精英與知識精英的分裂，另一類是權力精英內部的分裂，它們導致了不同的後果。1957年反右運動是權力精英與知識精英分裂的典型事件，它反映了革命與現代化在革命後社會的激烈衝突。由於社會主義革命是農村包圍城市道路，農民為中國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知識份子對社會主義革命態度中立，所以在革命後社會的權力分配上，知識份子顯然是沒有競爭力的。但是，新中國的大規模經濟建設又迫切需要高級技術人員來參與。這就形成了革命分子與知識份子的矛盾，最終以知識份子的大潰敗而告終。知識份子被從經濟部門和技術部門排擠出來，革命積極分子和善於思想組織工作的農民填補了空缺，人力資源的參數改變了。這也是「大躍進」政策得以出臺原因之一，掌握現代化技能和知識的知識份子被剝奪了政治參與的可能性，不能對經濟決策施加影響。

權力精英的衝突在革命社會就已存在，不過在強大的軍事壓力之下和革命的共同目標，衝突的雙方表現出了較強的容忍，權力精英的分裂是很有限的。但是到了革命後社會，中國共產黨已經取得了軍事上的決定性勝利，而另一方面1956年之後中國不存在示範模式，這都導致潛在的衝突表面化，不同的革命經歷、不同的權力個性產生不同的政治決策。在革命社會參加不同革命事件和組織的人同時發展了他們自己個人的關係網絡和集團個性，導致衝突的集團化，權力精英衝突擴大了。從1959年廬山會議開始，權力精英的分裂一步一步激化，由個人衝突逐步演變為集團衝突。這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表現得尤為明顯，林彪集團的形成革命社會和革命後社會初期實行的軍事政權有關。另一方面，「那些在劉少奇領導下從事『白區』工作或地下工作的人，在動亂的1966至1967年時期一般遭到與其領袖相同的命運。」²²權力精英的衝突造成了政治失序和權威流失，現代化讓位於「革命」，結果「革命」只是成為了幻想，現代化的受挫卻成為了現實。

其次，在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形成的高度集權結構在革命後社會的延續並走向極端，是現代化受挫的重要原因。在革命社會，在強大的軍事壓力和嚴峻的經濟條件下，軍事效率和經濟績效是權力結構構建的首要原則，它有利於軍事指揮、政令暢通和節約成本。在蘇區時期，就存在黨軍不分問題，在抗日根據地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當黨「政」在機構和組織上是分開的，但在工作和職能上是不分的。這種集權結構是縱向和橫向的雙向集權，黨、「政」、軍、社的權力集中於黨組織，而下級機關要對上級機關絕對的服從，權力又集中於領導機關。這就形成了黨是「行政機構」、群眾團體的領導機構，黨的權力又集中於黨的領袖的一元化領導體制。當然，中國的革命是社會主義取向的，社會主義的建黨原則、意識形態也決定了高度集權結構的形成是一個必然的歷史過程。

在革命後社會初期，社會主義轉型、革命任務和經濟建設又進一步推進了高度集權體制。1949年1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中央人民政府內組織中國共產黨黨委會的決定》和《關於在中央人民政府內建立中國共產黨黨組織的決定》，加強了中國共產黨對政府的體制

內領導。同時，中國共產黨還加強了對社會的集權，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單位體制的形成是政黨權利向社會滲透的體制保證。高度集權體制在革命後社會初期發揮了積極作用，保證了黨對社會和政府的領導，有利於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和大規模經濟計劃的實施，保證了黨和政府有效地汲取社會資源並進行再分配，對於取得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也有積極意義。

1958–1966年中國高度集權體制開始走向極端，形成了執政黨、國家、社會一體化。1958年1月，在南寧會議上毛澤東批評了國務院和經濟工作部門的「分散主義」。²³隨後，黨中央決定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具體領導政府各職能部門。1959年，毛澤東在八屆七中全會的講話提綱中提出，「權力集中常委和書記處，我為正帥，鄧為副帥」，「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²⁴。由此，黨對政府的絕對領導形成了，社會權力集中於黨組織，黨組織權力集中於領袖。在農村，人民公社體制是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之間的關係不存在任何的獨立性，人民公社處於黨委的領導和控制之下。在城市，共產黨加強了對單位的控制，中共中央於1964年發出《關於在全國工交系統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和機關的決定》，要求在工交系統內部建立政治工作機關和政治領導制度。黨形成了對社會的絕對領導。

執政黨、國家、社會一體化是高度集權體制的極端形態，是指執政黨、國家、社會結合成為一個整體的過程或狀態。它的典型特徵是：一、高度集權。國家和社會的權力集中於執政黨，執政黨主導國家，國家主導社會。二、結構一元。一黨專政，政社合一。三、職能重合。執政黨行使著國家和社會應履行的職能，國家政黨化，社會政治化。執政黨、國家、社會一體化帶來以下惡果，導致現代化的危機。第一，政黨權威流失。執政黨、國家、社會一體化是導致執政黨對國家和社會的全面主導，執政黨絕對的權力超越了民主集中制的限制，任意踐踏憲法和法律，侵犯個人自由和權利。在「文化大革命」末期，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體制遭到普遍質疑。第二，國家能力虛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國家機關處於執政黨的嚴密控制之下，失去了行使行政管理的權力，權力的缺失直接導致國家能力虛弱。第三，社會自主性喪失。社會受到執政黨的束縛，既無權利也無能力進行自治，人民民主成為有名無實的幻像。

第三，社會主義革命意識形態制約著現代化的發展。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時期，在革命的過程中社會主義革命意識形態在革命分子中逐步形成，伴隨著政治動員向農村和城市擴張，受長時間革命象徵、領袖魅力和思想灌輸的影響，社會主義革命意識形態內化為人們的政治心理。社會主義革命意識形態對於取得革命的勝利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一直延續到革命後社會並且愈演愈烈，阻礙了現代化的進程。

在社會主義革命意識形態的束縛下，人們混淆了現代化和資本主義化兩個不同的概念。社會主義是批判資本主義的產物，社會主義革命就是要推翻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和上層建築。但是現代化與資本主義在社會主義者看來有不可分割的聯繫，一方面，西方的現代化是通過資本主義方式實現的；另一方面，西方的現代化與資本主義都具有明顯的帝國主義傾向，在中國激起了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所以，在革命後社會人們往往把市場經濟、財產權、法治、權能分立、人權、民營經濟等看作是資本主義的內核而徹底地拋棄。殊不知，這些也是現代化轉型所必需的。

在社會主義革命意識形態的束縛下，革命和階級鬥爭成為了人們的政治心理，對革命後社會的現代化建設起著破壞作用。在中國大陸完全統一和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革命和階級鬥爭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但是，革命和階級鬥爭的政治心理作為革命的遺產並沒有隨之消失，而在50年代中後期重新復活。革命和階級鬥爭的政治心理導致了社會政治化，政治投機

和權力鬥爭成為獲取社會資源的唯一途徑，經濟、文化和榮譽等價值依附於權力，其結果就是積累性不平等。革命和階級鬥爭的政治心理還造成社會的革命恐怖，政治參與迅速增長突破了制度化的容納能力，政治秩序混亂，無法有序地組織大規模經濟建設。

在社會主義革命意識形態的束縛下，中國領導精英把軍事戰略放在首要位置，並且通過政治動員來進行經濟建設，中國經濟發展失去平衡。為了加強國防建設，建國初期的經濟建設的重點放在發展重工業上，中國農業和輕工業發展滯後。政治動員式工業化具有致命缺陷，政治動員往往是無計劃的、無序的，同時被動員者往往是政治積極分子和農民，經濟建設只要求數量而技術含量低。政治動員式工業化還導致對糧食的過渡收購，工農業發展進一步失衡，反過來又嚴重制約了工業化的發展。

註釋

- 1 英大衛·米勒、韋農·皮格丹諾·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C，鄧正來等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第656頁·1992。
- 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8頁。
- 3 美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等譯，北京：三聯書店·P241·1989。
- 4 轉引自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第242頁。
- 5 美查默斯·詹隼，革命：理論與實踐，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第58頁·1993。
- 6 美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等譯，北京：三聯書店，頁242·1989。
- 7 美巴林頓·摩爾，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拓夫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年。
- 8 美查默斯·詹隼，革命：理論與實踐·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第183頁·1993。
- 9 謝立中 孫立平·二十世紀西方現代化理論文選·上海：三聯書店·第460頁·2002。
- 10 王滬寧，革命後社會政治發展的比較分析·載《復旦學報》1987年第4期。
- 11 美 羅茲曼，中國的現代化·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頁272·1998。
- 12 美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等譯·北京：三聯書店，頁32·1989。
- 13 美羅茲曼，中國的現代化，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頁266·1998。
- 14 美巴林頓·摩爾，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拓夫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年，頁147。
- 1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77頁。
- 16 《列寧全集》，第6卷，第11頁。
- 17 《列寧全集》，第43卷，第64頁。
- 18 《列寧全集》，第40卷，第33頁。
- 19 《列寧全集》，第41卷，第11頁。
- 20 林尚立，當代中國政治形態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頁262。
- 21 美湯森等·中國政治·顧速等譯·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2。
- 22 美麥克法誇爾·費正清編，劍橋中國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58。
- 23 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下卷），第650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

2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524頁。

孔凡義 1976年生，男，政治學博士，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助教，近年主要著力於政黨理論、官僚制理論和中國政治發展的研究，發表論文多篇。參譯《權力》，吉林人民出版社，即將於今年出版；參編研究生教材《政治學理論和方法》中「政黨」一章，天津人民出版社。講授《政治學原理》和《當代中國政治制度》課程。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三期 2005年10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三期（2005年10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